

大学出版社的真正理想是什么

□ 蒋东明

在实行出版社“办社审批制”的中国,大学出版社几乎都建在国家的重点大学。在重点大学建立出版社,其宗旨和作用肯定有别于一般的地方出版社或商业出版社,那就是要利用大学出版社从属大学的地缘优势,依托大学的学术力量,从出版方面反映大学的学术成就,弘扬大学的学术风范,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。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,也是大学出版社自身的优势和生存之本。

一、大学出版社被赋予的理念和功能,使它必须拥有理想主义色彩

在我国高等教育日益普及,各类大学雨后春笋般产生的今天,重点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?首先重点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,不是简单地使受教育者拥有一技之长,而是要让他们拥有更广阔的知识,更完美的人格,无论在思想上、专业上都要对社会承担更大更深远的责任。一句话,重点大学不仅是在训练一种人力,而是在培养人格。其次在传播知识方面,大学是要出思想的地方,是科学研究和传播的圣殿。历史证明,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间,往往并没有多少关系。一流大学应有超越世俗社会的勇气,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,成为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建设者和守望者。在为社会服务方面,虽然重点大学是为我们这个社会服务的,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,它并不一定要立刻满足我们这个社会的即时需要,而是着眼于社会的更长远的利益。只有这样,这些重点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。如此看来,重点大学并不能急功近利地照搬市场机制,急忙去办那些最热门的专业,对见效缓慢的基础学科失去耐心,一流大学并非只是一个创造利润的机构,也不能办成一个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企业。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说:“大学是社会之光,不应随波逐流。”集

中了我知识精英的重点大学,在追求办学条件、办学规模的同时,最不能缺的是它的办学理想。

大学出版社作为重点大学的一分子,无疑应把这种理想融入自己的追求,并成为这种理想的实践者。被公认的大学教育的三大支柱力量为优秀的师资、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,以及健全的大学出版社。作为“大学的第三势力”的大学出版社,应具有传播学术与知识的功能,具有影响社会、启迪思想的教育功能,同时还具有为本校反映科研成果、推行办学理念和树立特色形象的公关功能。我在厦大出版社工作多年,深感“大学”二字的分量,特别是名牌大学出版社的价值更是一般出版社所不能替代的。不少作者跨洋过海找到我们,不少作者不计稿酬多少而选择我们,就是希望借大学出版社的品牌,借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底蕴,达到传播其学术的目的。因此,对大学出版社来说,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中必须时刻保持着那份理想主义的色彩。

二、大学出版社的真正理想就是通过出版的手段达到弘扬学术思想、积累和创新文化的目的

理想是我们事业所期望达到的目标。之所以称之为真正理想,就是我们在追求办社规模、发行码洋、出版利润等各种目标时,必须始终把创新和积累文化、弘扬学术思想作为我们工作的真正目标。作为大学出版社这样一个有特别内涵的文化机构,就要把自己摆在推进和弘扬大学学术成就这样一个地位,走一条学术化出版的道路,把出版优秀学术图书作为自己的办社理想和不懈追求。

大学是要出思想、出人才的地方。作为大学出版社,通过它的出版物的传播,强化其学术功能,是因为大学出版社与大学天然的学缘和地缘优势,最易站在学术前沿,最了解大学课程改革与设置,并能直接参与理论攻坚和创新以及新教材的编写。大

学出版社通过自己的出版活动,反过来促进了大学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工作,对学校的学科建设,提高教学质量,弘扬大学的学术风范,都起到别的出版机构所无法取代的作用。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追求专业分工的情况下,如果我们大学出版社能够专注于学术积累,形成自己的特色,那么我们的工作不仅会对学术发展和思想传衍做出自己的贡献,还会因其不可替代性获得社会的认可。在出版市场激烈竞争中,我们出版人每天都要面对许多抉择和判断。当我们带着一种信念和追求时,我们在心灵深处的那种好恶便会驱动着我们的选择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很有意思:“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,要把自己的事业当做一件艺术品看待,只求满意理想和情趣,不斤斤计较于利害得失,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,伟大的事情都出于宏远的眼光和豁达的胸怀。”作为大学出版人,我们的职业要求和使命感,使我们不仅可能而且必须“把自己的事业当做一件艺术品看待,只求满意理想和情趣”;使我们必须始终满怀一种冲动,一种独到的眼光,以求自己的出版物能感召读者,征服读者,传承文明,播种智慧。

三、出版发展史并不是利润、码洋史,它本质上是出版优秀图书的历史

一个时代的文化,一个社会的文明,在很大程度上是蕴藏在出版物中的。回望百年中国出版史,张元济、邹韬奋、胡愈之、叶圣陶等无数出版界的先贤,他们的事业传之久远,正是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利禄,超越短视,对文化传播的贡献所赢得的。在当今时代,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,但在文化领域,具体到出版领域,浮躁、粗率、急功近利几成通病,许多书越来越乏味,重复跟风,矫揉造作,即使是冠以学术著作之名,平庸或东拼西凑的书比比皆是。书是越印越漂亮,但真正长留于读者心中,让人爱不释手的书却越来越少。不可否认,我们所目睹中国出版界繁荣的背后确实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对规模、码洋和利润的追求,越来越多地为经济利益所驱动而热衷于短线做大,越来越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化、价值和人性的意义,大量的辞书不合格现象正说明这一点。

其实,出版界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,在自身发展的竞争压力下,任何一个经营者都不敢忽视追求利润。特别是今天,出版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时,面对生存的危机,谁敢在商不言利。事业与产业的对立统一,在今天依然是出版工作者的一个主要矛盾;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平衡,追求二者融合中的超越,仍是出版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、常谈常新的问题。复旦社贺圣遂社长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出版的意义究竟何在?出版工作究竟是“以码洋论英雄”,还是一份创造性的诗意的愉悦。我们出版人整天东奔西走,忙里忙外,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追求那些单纯的数字吗?除了码洋,难道我们就没有生存的价值?

大学出版社20多年的发展中,已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教材和学术著作,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版业光辉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检验出版工作的成就,是以它的出版物的整体效益为标准,尤其是它的思想性,码洋只是其中的一方面。我曾到过南昌的滕王阁,这个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屡毁屡建的楼阁,并不以其建筑物的宏大而吸引游人,而是因有唐代天才少年王勃一首即席之作《滕王阁序》而闻名天下。代代相传的是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千古佳句。徜徉在这被称为“瑰丽绝特”的“西江第一阁”前,我仿佛领悟了出版工作的真谛,《滕王阁序》能流传久远,是因为它的字里行间蕴含的豪迈诗意和厚重的历史经纬,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。如果几年,几十年,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,还有人提起我们出版的书对他的影响,得到他的喜爱,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朽的。我们出版人一定要把握着出版业的终极目的,而不是舍本逐末,把手段当做目的,以至于在激烈的竞争中迷失方向。

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,不仅要有经济的腾飞,还要有文化的跨越,综合国力的竞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它的文化力。这是一个需要文化创新的时代,是一个需要文化精品的时代,也是一个渴求厚重之作、传世之作的时代。大学出版社的真正理想,就是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建设者。

(作者为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)